



中国作家协会

2005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生命的高度

献给红军长征七十周年

这是二十一世纪四月的一天/我 写下这些诗句/希望不是一个人的纪念/笙歌之后 卸下你舞池中的脂粉/
站在粗犷的原野 面对北风/让灵魂与春风一道/去经历/生命中的长征

李迎春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作家协会
2005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生命的高度

献给红军长征七十周年

这是二十一世纪四月的一天/我 写下这些诗句/希望不是一个人的纪念/笙歌之后 卸下你舞池中的脂粉/
站在粗犷的原野 面对北风/让灵魂与春风一道/去经历/生命中的长征

李迎春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高度/李迎春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9

ISBN 7-5039-3065-9

I. 生… II. 龙… III. 诗歌—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9711 号

生命的高度

著 者 李迎春

责任编辑 斯 日

责任校对 张 莉

封面设计 唐东仔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3065-9/I·1411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作者简介

李迎春，男，1974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现供职于上杭县委宣传部。创作以诗歌、散文为主，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其中电视专题片《走近上杭》（撰写）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由福建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散文《向北向南》荣获第十六届华东报纸副刊好作品评选一等奖。



序一

蔡其矫

以诗写史，最大的长处，是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把历史事件解释清楚；在这过程中，诗与史这两大端，并驾齐驱，两头皆重，互为第一，而且紧紧结合成为统一体。

回忆长征，首先会想到它的起因，就难回避领导的问题：为什么会让一个不明中国的国情民情的外国人来指挥战争？为什么越过雪山草地之后与四方面军会合，会发生路线分裂？

李迎春这篇《生命的高度》，大体上对这两大重点都有所涉及，这就比其他这一题材的许多诗篇明智一些、勇敢一些，不致沦为空洞歌颂的潮流当中，完成诗史最起码的要求。

其次在结构上除小节序曲和尾声外，按时间具体日期划分为六部分，也顺理成章符合客观事实的最简便方法，条理分明，叙述清楚。

最后，在重要段落后面，能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不但思绪灵活，简明实在，而且避免枯燥，兴趣不减。

作者生活和工作都在闽西红色土地，能把闽西地区长征成员的若干事迹顺带几笔，也是聪明之举，亲切而且理所当然。

从头到尾，诗句沉重有力，诗的语言风格稳固平实，这是基层作者诚实的声音，为那伟大的历史唱出最朴素的颂歌。

二〇〇六年三月七日

北京

（作者系著名诗人、福建省作协顾问）

序二

诗歌如何书写“时代”

赖或煌

在享乐主义和波谱文化普遍弥漫的时代，处于“时间川流”中的写作者终于和这样的困惑遭遇：他的写作和时代之间有着一种怎样的关系？某种强大的压力是，历史的宏大叙事不仅被瓦解为反思的对象，而且被解构成“消费”的对象——举目可见的是对历史“戏说”、“戏仿”的图像景观。如果说，启蒙、理性等等崇高的词汇曾被灌注了太多的意识形态，成了某种压迫人的力量，内中的权力架构、压抑机制的确应该得到分解，但现今的情形是，人们还未来得及为此庆幸，文化工业的

软化功能却发明了新的“消音器”，以致用最拙劣的行径来放逐和丑化启蒙、理性，也获得了它的合法性；当可能的严肃反思被巧妙地转换为“噱头”，“后现代”的做派也终于显露了它的狡诈乃至更为可怕的权力欲望，新的压抑已经隐秘或公开地掌控了人们。在新一轮的权力置换中，对过往的“启蒙”和当下的“操纵”的拷问就很可能因此被一同搁浅了。

一方面，它体现出了探讨“启蒙”所遭遇的双重困难——既要避免再度滑入蒙昧主义的圈套，又要抵抗大行其道的极端相对主义（“怎么都行”是“后现代”的标志之一）所搅起的意义与道德真空。另一方面，当蒙昧主义和新的空虚都表露了它们的丑恶嘴脸，对“启蒙”的重新审视就可能发掘出更为开阔的“解纽”空间。但现今对“启蒙”的谈论显然不是为了重蹈“新左派”的老套，也不是为了给某种浅薄的道德主义招魂，而是为了真正彰显，在进退失据的境遇中“崇高”等等话题所固有的庄严与力量。写作和“时代”之间的关系不应该被动地表现为“是什么”，更不能像“躯体写作”那样，如此草率地以一个未经戒备的“躯干”来恣意羞辱他们的写作主体，而是“应当怎样”。因此，在当下，把写作和“时代”的问题带到写作主体的“心”（而不是躯干）上，可以看作是对在各

种“主义”中分崩离析的“主体”的重塑。

在这个意义上，李迎春的《生命的高度》凸现出了不同寻常的价值。这首近三千行的长诗，如此扎实地扎进那个时代的深处，把倾听到的宏大回响成功地转换成了自己对“叙史”的独特构造。长征无疑应该归入到战争的题材。尽管人们会说，历史总是以它本有的力量来展现它的庄严的。然而，在《生命的高度》那里，不全是因为战争题材所积累的庞大能量，使这部长诗“附着”了某种外加的胸襟和气度，而是诗人以他出色的架构能力成功地处理了“人”（人类）命运卷入战争时的挣扎、奋进与牺牲。当然，诗人为此却要担当更多的风险：第一，面对这种大题材，如何不被题材的专断带入到单向的“叙事”之中，以疲惫的追述激情随之俯仰，牺牲了自身的主体性；第二，个人如何将自己的臧否和真知灼见既体现为对题材的征服，又表现出对基本“材质”的尊重，以一种开放的结构来释放和发现题材，打造它的具体性。这就意味着，面对这类题材，对诗人的最重要的考验就是，在历史的张扬和个人才华的创造之间必须保持一份难得的张力。

然而，在伟岸的历史面前，从自己的观感中析分出既是“历史”的又是“自我”的具体性，如何可能呢？如果说，过去

的许多写作在“结构”历史时因为没能把“自我”作为一个有效的骨架嵌进奔突的时代气流中，最后淹没了写作的自主性，成为衔接宏大叙事的被动的传声筒，那么，重提“自我”在面对历史的主体性其实就是，把历史（题材）作为一份有待驯服的材料的同时，“自我”所发动的构造能力又是以扎根于与历史的磋商之中为前提的，质言之，在个人才华和历史之间培育出一种新的有助于互为发现的“洞察力”才是最为重要的。

因此，《生命的高度》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的写作构成了对陈旧的观物和写作模式的强有力的挑战。很显然，诗人已经不再像以往的写作者那样，安于在宏大叙事的题材之下做无所作为的“材质”的搬运工，而是非常果断地突进了历史本身，从而冲破了类似题材顽固的闭抑性——生机勃勃地展现了“自我”的创造能力。进入了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不再是被动的裹挟物而在历史中“消声”了。事实上，诗人是如此夺目地让“自我”跃上了历史的地表，以至我们一开始就能听到这是一个积极的主动者在讲述着“历史”：

我看见疯狂的雨

风的心灵 对于遥远的往事力不从心

记忆原本虚幻 何况那些染黄的头发

穿洞的牛仔褲的扮相

时光将草叶辗进机床 成为牛奶

在我们心中发酵成长 工业化

的进程 排挤着体温与疼痛

七十年前的故事和韩流一起进入

黄金剧场

.....

这是二十一世纪四月的一天 我

写下这些诗句

希望不是一个人的纪念

笙歌之后 卸下你舞池中的脂粉

站在粗犷的原野 面对北风

让灵魂与春风一道

去经历

生命中的长征

序

二

在此，诗人构筑的时间关系非常值得注意，长征七十年之后，把作为陈迹的历史和“新新人类”所追逐的“韩流”并置

在一起无疑是意味深长的，这是一个双重的时间值。我以为在这里诗人表露了某种与现实争辩的味道。站在“二十一世纪四月的一天”的观测点上，对这种题材作出了自己的重构，与其说这出于对现今抹去记忆的时尚的激烈争辩，毋宁说是为了通过写作与历史建立起新的关联。因此，我觉得诗人重新瞩目于“历史”的动机才是最重要的，它不排除某种“教化”的色彩，比如希望“你”“笙歌之后/卸下你舞池中的脂粉”，但他的更多的嘱意所在是经历自己“生命中的长征”。

惟其竖起了作为测知和激活历史的这根“自我”标杆，历史才得以进入书写的内部，而非以一种隔阂的揣度来臆测历史模糊的面影，为此，和历史有关的那些部件在他的抒发中才显得非常具有可感性和具体性：

福建长汀 罗汉岭

安放着一个诗人的愿望

自从我十六岁那年 穿过

拥挤的小城 拜谒在

高高的纪念碑下

瞿秋白三个字 就鼓胀我

年少而崇高的心灵

通过“自我”对历史的激活，使它成为可以触摸的细节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作为“历史”的原初状态的“材质”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具备了重新构造的可能。“重新构造”当然存在粗暴地肢解历史的危险，它的后果和以往的写作在宏大叙事中泯灭“自我”的自主性是一样的，尽管前者是以“自我”来涂改历史，后者是以历史来压抑“自我”，但它们在历史与“自我”的分裂点上殊途同归了。不过，在《生命的高度》那里，寻求历史和“自我”的磋商与“共振”一直是它一以贯之的追求，也正因此，历史就不再是作为一个绝对化的图腾进行崇拜了，而是当作一个几乎可以探到体温的活物来对话的；即使在最正襟危坐的时刻，历史也是一个平等物对应着自我的认知。这体现在书写“遵义会议”的机智中，以一种略带反讽的笔触刻画历史构成物的另一面，彰显的却是对这一面的“肯定”：

军阀柏辉章幸而

建造了 遵义的豪宅

让后人在历史的叙述中 找到

他的名字 漂亮豪宅联系着

一个人的命运

一支队伍的未来 和

一个国家的新生

我以为这和诗人理解了历史的血肉来自细节的具体性有关，才使得他征用的材质具有了开放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诗人没有拘泥于面面俱到的“叙史”，没有一网打尽的野心反而解放了他的抒写能力，比如选取“血浴湘江”作为一面勾连“反围剿”的“取景框”，从中既有在横断面上对某次突围的具体刻画，又有在纵深的层面对不同时空的把握，如湘江与苏区、当时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开放”得益于诗人对宏大叙事的“撒手”，是砸碎“镣铐”之后的自由。我以为这种独具匠心的结构安排对今日的史诗写作是有一定的启示的。这种结构使得诗人在“长征”的时空之旅中显得特别悠然有度，全篇的节奏也因此而特别跌宕有致。

而在今天这样的文化症候中，《生命的高度》所昭示出来的价值显然应该得到重视。如果说，诗歌写作因为内外交困而备受攻击，主要来自对它的“力量”和“诗格”的怀疑，那

么，值得细致析分的是，所谓的“力量”与“诗格”的没落究竟和什么相关？尽管人们大可以埋怨，在消费时代的“榨汁机”面前，过于庄重、不苟言笑的“历史”早已不是这个时代的取材了，因为它和甜腻的文化果汁解育下的“哈一波”一族的口味相差太远，但是，“形象”的萎缩显然不能过分迁怒于这个时代的品味，无论非诗时代的氛围使诗歌遭受多大的重创，同样也未必令人特别沮丧，更值得反思的或许是，诗歌的反历史冲动（行动）所带来的失范——当然很长的时期诗歌的确有必要清除那种代表霸权和压抑的宏大历史，但现在不太正常的，摆脱“操控”之后义无反顾地跃进对“自我”的心境或私密的温柔乡的抚摸是否也意味着自甘颓唐呢？是否也存在对“力量”与“诗格”的有意放弃呢？我们当然不是要重新返回到一体化的写作魔圈中，但现今形形色色的打着“个人化”旗号的写作和什么相关呢？和美学吗？斩断历史这根情缘之后推卸诗歌本应承担的责任就成了自然？因而，从重申诗的“力量”与“诗格”来看，作为一部有意地构建“自我”与历史的关联的长诗，《生命的高度》无疑是出色的并有着重要的启示。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师、文学博士、诗人）

[目录]

序一 蔡其矫 / 1

序二 诗歌如何书写“时代” / 赖或煌 / 3

序曲 生命中的红色畅想 / 1

1934年10月16日：月过于都河 / 7

1934年12月1日：血浴湘江 / 27

1935年1月15日：遵义曙光 / 53

1935年6月12日：会师达维 / 83

1935年10月22日：宣言黄土地 / 111

1936年10月10日：欢歌会宁城 / 141

尾声 从新的高度出发 / 167

后记 / 173



序曲

生命中的红色畅想